

论洋务新政时期清政府内的守和主张

黄 玮

(上海外贸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, 上海 201620)

[作者简介] 黄 玮(1953-), 男, 上海人, 上海外贸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,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与革命研究。

[摘 要] 洋务新政时期除非遇到新的重大侵犯, 竭力维持“中外相安”局面是清政府内的普遍主张, 即使是公认的爱国官吏或极端仇外的守旧派也持这种主张。不能将这种避战守和主张简单地斥为投降主义。一些人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敌之强, 己之弱, 因而认为中国暂不宜战, 许多人并且希望利用和局振兴自强。

[关键词] 清政府; 洋务新政时期; 守和主张

[中图分类号] K25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6)06-0806-06

洋务新政时期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时期, 清政府开始重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, 而首要问题是和战问题。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再次战败, 而且侵略军一直打到北京, 皇帝出逃, 可谓创巨痛深。战后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, 不仅英、法、俄、美, 而且西方许多国家接踵而至, 连东洋小国日本也野心勃勃, 欺凌不已。如何对付这样的局面, 清政府比以前是清醒多了, 对处理中外关系也注重多了,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, 可为一个标志。

一、维持中外和平局面是清政府内普遍的主张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 要求尽量避免与外国决裂和战争, 维持中外和平局面成为清政府内普遍的主张。战后不久负责与英法俄交涉的恭亲王奕訢、大学士桂良、户部左侍郎文祥上奏, 主张以“外敦信睦, 而隐示羁縻”为今后的外交方针。咸丰帝命大臣们讨论这一奏折, 很快, 大臣会奏称奕訢等人所言“按切时势,”请采纳。此后, 奕訢等人及其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确实竭力维护“中外相安”的局面, 如他们自己所言“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, 致蹈决裂之害”。不仅战后初期, 而且若干年后, 在太平天国、捻军等农民起义被镇压后, 避战守和也仍然是清政府内普遍的主张。1867年总理衙门就如何对付次年英国将来修改条约一事, 请清廷命各省督抚熟筹对付办法, 总理衙门并且拟出英国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种要挟, 供大家考虑。各省督抚在奏复中纷纷表示:“今之时, 养晦负重之时, 非攘臂疾呼, 轻言尝试之时也,”“今日处极难之势, 自不可轻启事端,”“于万难迁就之中, 为妥维全局之计。”曾国藩, 李鸿章一向被认为是对外退让妥协派的代表人物, 他们的确也是主和最力的。1870年7月直隶总督曾国藩在关于天津教案处理的奏折中提出“坚持一心, 曲全邻好”, “守定和议, 绝无更改”的主张, 希望“用能中外相安。十年无事。”李鸿章并且主张“目前固须力保和局, 即将来器精防固, 亦不宜自我开衅。”他一贯持此主张, 不遗余力。

公认的爱国将领左宗棠曾有“绝口不谈议和事, 千秋唯有左文襄”之誉, 其实他并非如此。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关系, 他主张:“惟有遇事守定条约, 礼以行之, 逊以出之, 冀相安无事”。在率军平定

新疆叛乱后向俄国索还伊犁时,他主张“尚逊以出之,不可衅自我开,令彼得有借口”。后来他表示不惜一战,并进行了军事部署,但还是主张“先之以议论,委婉而用机,”尽可能用和平谈判解决问题。曾纪泽也是受到人们高度赞扬的爱国官吏。在如何索回伊犁的问题上,他对左宗棠的在不得已时用武力夺回伊犁的主张很不以为然,认为是“一偶之见,未尝统筹全局耳。”他在上奏中申言战之不宜,希望通过谈判,“庶和局终可得全,不遽决裂。”在中法战争时,他被认为是主战派,但是他虽然主张对法强硬,却并非主战,而恰恰极希望避免与法国开战。1884年2月,当时法军已进攻驻越北的清军,他仍表示“知事势日迫,然仍欲和平了事。”他说:“内审国势,外度敌情,实未敢侥幸生事,存孤注一掷之心”,对“传闻异词,乃有李(注:指李鸿章)主和,曾(注:指他本人)主战之说”表示不同意,申言他“不欲启衅之心,未始不与合肥(注:指李鸿章)同也”,表明他的主张是“特欲吾华实筹战备,示以形势,令彼族知难而退”,备战正是为了避战。他对“吾华以惧战过甚,反酿成不得不战之势”大为叹息。

曾国藩父子、李鸿章、左宗棠都是洋务派,有同样的主张也许是自然的,然而,就是那些极端仇视洋人,对外来事物十分憎恶,对师夷长技也反对的守旧派,其中也不乏主张避战守和之人。醇亲王奕譞原是守旧派的首领,曾有强烈的排斥外来势力的愿望。1869年他在上奏中主张:“设法激励乡绅,激励众民,贤者示以皇恩,愚者动以财货,焚其教堂,掳其洋货,杀其洋商,沉其货船”,“亦可明告百姓,凡抢劫洋货,任其自便,官不过问”。但是,他显然认为官方并不适合这样主张,他说:如果“夷酋向王大臣控告,则以查办为词以缓之。”还是害怕决裂的。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,奕譞上奏说:“现在夷船已陆续来津,势必领兵者恫喝于外,罗酋等交结于内”,认为:“我之智力俱困,所求不遂,倏起兵端,所求果遂,国体荡然矣”。显然是担心引起战端的。他在为法国人视为罪魁,定要严惩的提督陈国瑞说项求情时说:“目前笼络才能,即将来复仇驱夷之要道也。”他也把复仇驱夷留待将来了。内阁学士宋晋也是反对学习西方技艺,主张恪守祖制的,在关于天津教案的奏折中,他表达了对天津反教会民众的同情,指出“天下得失,尤系民心”,但是他也认为“和局必当保全”,主张对案情实事求是,开诚布公,认为因此便可以“疑窦释而民心允服,各国更可相安无事矣。”另一守旧分子,大理寺卿王家璧在1875年3月奏议总理衙门的自强之策时,认为“毋庸日思变法,失我故步,”反对“事事师法西人,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,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”。虽然他认为以中国现有武器,再对将士“训以忠义”,即足以御夷,但他还是表示:“今之设防,……正欲彼此皆知有备,彼此莫敢先发,庶几可长保和局也。”翁同龢在甲午中日战争时被认为是主战派的核心人物,清军屡败后尚主张坚持不屈。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前不久,他也有避战守和的意愿和主张。1894年7月,他与另一个一贯主张对外强硬的重臣李鸿藻以及其他大臣上奏说:“我既预备战事,如倭人果有悔祸之意,情愿就商,但使无碍大局,仍可予以转圜”,然后陈述了与日本开战的困难,虽然他们表示,如果日本“仍要求必不可行之事,或竟先逞凶锋,则大张挞伐,声罪致讨”,但他们主张“倭人所请各条,如有不妥,我可议驳,如果有裨政务,亦可由我饬行,”表现了与日本妥协的倾向。

在没遇到新的重大侵犯或威胁时,清政府内反对维持中外和局的人似乎是没有的,虽然很可能有不少人并不情愿如此。在遇到外国新的重大侵犯或威胁时,清政府内是多主张抗争的,但是较普遍的意见仍是尽量避免决裂和战争,希望“不战而屈人”,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又不破坏和局。不仅对于欧美列强,而且对日本也是如此。清政府的不少人对日本是藐视的,称之为“东洋蕞尔岛邦”,“岛夷小丑”,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时也是如此。但是如前所述,甲午战争前夕,甚至翁同龢等也力图避免与日本开战。早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,清朝中央和前线的负责大吏们就已表现出不愿开战。虽然“明知彼之理曲,”虽然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、柳原前光和侵台日军司令西乡从道在谈判中都一再表现得不可理喻,虽然赴台清军已经厚集,负责台湾军务的沈葆楨也看到日军由于时疫流行而死亡累累的困境,他们也没有人主张进攻,驱逐侵台日军。李鸿章“谓闽省设防设备御……非必欲与之用武”,要沈葆楨“只自札营操练,勿遽开仗启衅”,并且要唐定奎军“到台后进队不可猛进。”沈葆楨“亦谓现在兵端未开,……似宜防之,而未宜遽阻之”,“诸臣意见相同,非欲遽成战局。”结果也就以对日本迁就了事。事后,清朝大臣们对“东洋一小国”“竟敢藐端发难”和对迁就了事,多深感羞耻和愤慨,认为“耻莫大焉。”后来更愤于日本并琉球、窥

朝鲜,有人主张“一俟海防少完,兵船足用……战舰直捣夷巢”,或者“将来有隙可乘,其曲在彼,自应兴师东渡,问罪虾夷”。但这只是不负实际军政责任的个别翰林、御史的主张,而且他们也认为这还得“俟边防既固,战守均有把握”之时才能兴师讨伐。这种主张没有得到什么响应,比较普遍的主张仍然是不要“轻启衅端”。

二、避战守和主张的理由是多方面的

那么,避战守和主张的理由是什么呢?清朝大臣们的理由不尽相同,归纳起来,大体上有这样一些:

(一)中国不堪战或不宜战

奕訢等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上奏说:中国不能忘记复仇,但是如果当时就“不忍其忿忿之心,轻于一试,必其祸尚甚于此”。就是说,如果当时就以武力复仇驱夷的话,肯定要蒙受更大的灾祸。中枢大臣们都表示同意。他们说:“捻炽于北,发炽于南,饷竭兵疲”。后来他们又指出:西方国家“器械精良,心志坚韧”,其势“已合而不能遽离”,“已强而不能遽弱”,“而我独以离且弱者当之”。李鸿章当时也认为“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于中国,”并且,外国势力“内则狎处鞞毂之下,外则布满江海之间”,因此他觉得“可危实甚。”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后,认为中国不堪战或不宜战的看法在清朝大臣中仍是较普遍的。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,中法关系紧张,法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以武力进行恫喝,曾国藩在上奏中声称:“中国目前兵力,断难遽启兵端。”他在致李鸿章的信中更明确地说:“至备豫外洋,则不惟畿甸孱军骤难及此,即他省兵力数倍于直隶者亦断不足以敌洋人。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对当时如果开战的忧虑更多:“一国构衅,各国连衡,兵端一起,沿海沿江各省,防不胜防。非特恐无此兵力,且恐饷源立匮。”如前所述,清朝大臣们虽然对日本心怀藐视,但是对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,还是以迁就了事。总理衙门的理由是:“一经决裂,滨海沿江处处皆应设防,各口之防难恃……”,“自问殊无把握。”愤激于日本侵台事件,总理衙门建议各省将军督抚筹议海防,李鸿章在奏议中力陈中国之不堪战,中国“即暂胜必终败。”左宗棠向来是不畏惧洋人的,但他也希望避战守和,他的理由是:“国家多难之余,如大病乍苏,不禁客感”。在向俄国索取伊犁时他对用兵亦有所顾虑:“此时兵威已盛,欲战即战,

。1870 年 11 月他在致曾国藩的信中说：“
。1874 年他上奏说：“
”。1879 年 12 月左宗棠的上奏再次表明了这种看法：“
。1875 年他在福建按察使任上致函总理衙门议海防事，
1884 年在“
60 年代预备修约事宜的群臣奏议中，
1875 年 7 月致李鸿章的信中说：“

①

Key words: the Qing Dynasty; the period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New Deal; the assertion of peace maintainers